

瀕危方言的研究大有可為 ——讀丘學強《軍話研究》

詹伯慧*

一

近年來，在我國語言學界興起了一股調查研究瀕危語言和方言的小小熱潮：“搶救”瀕危語言和方言被看作是語言調查研究的當務之急；書店裡出現了《瀕危語言研究》的專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共同提出的“中國瀕危語言和方言調查研究與新編《中國語言地圖集》”課題被列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科研專案，正在加緊組織力量，落實措施，開展研究。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丘學強博士這本《軍話研究》，正是作為這一課題的重要組成部分適時完成的佳作，堪稱是撒落在瀕危語言和方言研究園地裡的一場及時雨。

“軍話”這一特殊的方言零星散落在我國南方粵閩瓊桂諸省的一些地區，一般都處於強勢方言的包圍之中，性質近似通常人們所理解的“方言島”。這些與眾不同的漢語方言在它所通行的有限地域內代代相傳，但過去一直未能引起語言研究者足夠的注意。1956年夏天，我有幸參加中國科學院少數民族語言調查第一工作隊，跟隨嚴學窘先生和王均先生踏足海南島調查黎語，途經島上極南的崖縣（今屬三亞市）時，發現一種不同於周邊屬閩語系統海南話的“軍話”，匆匆忙忙用身邊僅有的一千多張方言調查單字卡片把這一很有特色的方言記錄下來，回京後按照袁家驊師的指示，根據有限的語料把調查所得整理出一篇題為《海南島軍話語音概述》的文章於1959年8月在《語言學論叢》第三輯上發表。沒料到此文竟引起了海內外語言學界，特別是漢語方言學界的注意，被視為難得一見的“方言島”，此後經常為語言學著述所引用，作為一個在閩語包圍中的“北方方言島”的典型例子。當年我所揭示的這一既像北方官話，又具有較多一般官話所未見語音特徵的崖城“軍話”，之所以引起語言學界的矚目，關鍵還在於這個“軍”字令人引發許許多多的遐思。說實在，那時候我們腦子裡還沒有什麼“瀕危方言”的意識，更不會想到要趕緊採取措施來“拯救瀕危方言”了。

歲月匆匆。打從我“發現“海南島崖城”軍話“以來，轉眼半個世紀過去了。

* 暨南大學中文系。

幾十年來，我國的語言調查研究工作何止是“突飛猛進”四個字所能形容！如今放眼中華大地，每一個能用來作為社會交際工具的語言，包括不同民族的語言和漢民族語言的各種方言，幾乎都有語言工作者染指過，調查過。完全沒有撩開神秘面紗、沒有人記錄過調查過的語言或方言，幾乎很難找到了。正因為幾十年來語言和方言的調查面已經大體上覆蓋了我國版圖的東西南北中，我們才有可能在此基礎上發現、瞭解到在現有的許多語言和方言中，有哪些是處於“瀕危”的狀態，急需進行記錄調查，做好“搶救”的工作；也才可能把調查研究瀕危語言和方言提到當前語言研究的重要地位上來。在新的形勢下，我們從事方言研究的人，觀念自然也應有所更新。當年頗有一點“孤證”味道的崖城軍話，如今已成為語言學界矚目的瀕危方言“軍話”系列中的一員。那時候由我粗略整理出來的一些特點，現在又有機會通過學強博士這本《軍話研究》重現它那獨特卻又瀕危的風貌，真是始料不及的事！

二

語言研究需要有心人。瀕危語言和方言的調查研究更需要有心有志之士，深入實地進行艱苦細緻的工作，才有可能在錯縱複雜的語言環境中挖掘到這類瀕臨絕種的語言資源，揭示出世上罕見的“語言稀品”的真實面貌，並進一步探求其形成及發展的脈絡。丘學強從事軍話調查研究的歷程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打從20世紀80年代初，他作為有志於漢語方言研究的暨南大學第一位攻讀漢語方言學碩士生，便對他接觸到的“軍話”這一漢語方言的“怪胎”情有獨鍾。他在1986年完成的碩士論文便是記錄描寫他家鄉廣東陸豐縣幾處“軍話”的《平海、坎石譚、青塘軍話初探》。事隔十多年，當他歷經人生曲折道路，“下海”而又再度“上岸”重啃漢語方言這根“雞肋”時，他考到我門下再攻博士學位。我問他闊別多年，再來研究方言有何打算，他竟毫不猶疑的回答：“繼續研究軍話”。好一個執著的丘學強！難怪他在本書的後記裡說他離開學術界的那段日子裡，總覺得自己有一種“與軍話有緣”的感覺。一旦回到方言研究的大家庭中來，他對軍話的調查研究簡直可以說是如魚得水，雀躍萬分，以至於“為了它，我常隻身深入窮鄉僻壤與“軍”的後代們同吃同住，拍錄下他們的笑貌音容，又間或腳踏泥濘、披荊斬棘，面朝殘碑古墓與他們同抒思古之情懷……”在“攻博”的三年時光裡，據我所知，學強由於是在職博士生，要兼顧學業和工作，又沒有寒暑假可以利用，每年都是抓緊利用“五一”、“十一”及春節等長假期自費到他計劃中的軍話地區進行實地調查，每年兩三次，這樣才終於收集到粵瓊兩省多處軍話的大量翔實語料，為博士

論文《粵、瓊軍話研究》的撰寫奠定了結實的基礎。在論文開題的時候，學強曾經想過就以《軍話研究》為題撰寫博士論文，我勸他還是別把攤子一下子鋪得太寬，先把粵瓊兩省的軍話弄清楚，下一步再來擴大研究面吧！他接受了我的建議，最後以《粵瓊軍話研究》為題，以兩省近十個軍話方言點為對象，寫出十來萬字內容豐富、頗具創見的博士論文來，獲得論文評審專家的一致好評，被認為是“迄今為止軍話方言研究的最好成績”，“作為第一篇全面論述軍話的論文，可說是十分成功的。”“具有較大的理論意義和重要的學術價值”，“是一篇優秀的博士論文”。難得的是：在論文獲得好評，學位獲得通過之際，丘學強這個“軍話迷”並沒有鬆一口氣、歇歇腳的想法，而是繼續盤算著如何進一步趁熱打鐵，鏗而不捨地實現他那要把調查研究的觸角伸進各省的軍話，最終實現讓軍話研究的覆蓋面擴大到所有軍話“營地”的願望。而就在此時，北京傳來了要請他主持“中國瀕危語言和方言調查研究與新編《中國語言地圖集》”研究課題中軍話調查研究子課題的消息，更進一步鼓舞了他的士氣，使他下決心要以只爭朝夕的精神儘快對那些尚未調查過的軍話開展調查，並且盡可能利用前人已經調查過的相關著述和歷史文獻、地方誌書所提供的歷史、人文資料等等來充實自己的軍話資料庫，為編寫全面反映軍話實況的《軍話研究》創造條件。去年當他聽說廣西北海地區也有軍話時，他很快就利用公眾假期背起行囊西進北海，調查了北海市合浦縣西南的永安軍話。經過近兩年來的努力，他所掌握的各地軍話相關資料比他所撰寫的博士論文增加了十多萬字。這就保證了這本《軍話研究》有足夠的翔實資料作為科學依據，有把握可以比較全面地揭示出各地軍話的真實面貌來。如今在《軍話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粵瓊閩桂四省（區）九個軍話點的音系，作者以親自調查過的廣東陸豐兩處軍話、海南儋州、三亞、東方各一處軍話、以及廣西合浦的一處軍話作為主要描述和研究的對象。這樣一來，雖然還不能說本書已經可以使讀者對分佈在四省（區）的軍話一覽無遺，但是，通過這本軍話專著，起碼我們可以比較全面地看到這種方言島性質的漢語方言的整體面貌，看到它們與周邊方言——閩語、粵語和客家話之間的關係、瞭解到各地軍話的實質了。本書第六章以《標音舉例》為題列舉了顯示七種軍話音讀的具體語料，又在隨後的第七章詳細列出一種軍話的詞彙總表。這就讓我們在大體上對軍話有所認識之後，進一步有機會看到活生生的軍話實際情況。就目前的條件來說，《軍話研究》作者已經盡力滿足讀者認識和瞭解軍話這種瀕危方言的需要了。

三

軍話的研究涉及許多理論上的問題。這些問題只能在掌握全面情況的前提下來

考慮。平面的描寫是必要的。但是，在描寫的基礎上，必須通過比較分析，通過共時和歷時相結合的方式，運用語言科學的理論來進一步探討擺在我們面前的語言事實給我們提出來的種種問題。解決好這許多的問題，才是我們調查研究軍話的主要目的，也是瀕危語言和方言的研究之所以值得重視的主要原因。《軍話研究》在描寫、概括各地軍話特點的基礎上，從軍話的歷史來源切入，把共時的現象跟歷時的比較結合起來，論證了軍話形成和發展的過程，從而對軍話的性質得出具有獨創性的結論，並由此而推斷出軍話的定義、歸屬和分類。這就把軍話的研究從理論的層面上大大推進了一步。毫無疑義，這正是這部《軍話研究》最具價值的地方。下面我們不妨看看作者在幾個涉及理論、方法的問題上是如何理解軍話的：

1 關於軍話的性質

以往“軍話”在人們的心目中大致就是一種在南方某一種方言或某幾種方言包圍下的北方方言島。在《軍話研究》中，作者通過剖析大量的翔實語料，綜合比較它與周邊方言的關係，對“軍話”的性質提出了具有創新性的獨特見解，修正了“軍話”都是北方方言島的說法。基於以下兩個原因：一、已知各軍話點距離較遠，且不成片，彼此間少有往來，甚至互不知道對方的存在；二、根據調查，各種軍話各具特色，互相間通話困難，從語言特點上看，也無法將其劃為同一方言。例如語音系統方面有的有-m、-p、-t、-k、尾韻，有的沒有；有的與北方方言相近的特點較少而與粵方言或客家方言近似的特點較多；有的近似閩語的特色十分明顯……如此等等，怎能一股腦兒把所有軍話都視為“南方方言包圍中的北方方言島”呢？由此《軍話研究》的作者得出他自己的結論：

“並非凡是軍話都可以劃歸北方方言”；

“如果從整個語言系統考慮，軍話雖然有不少與北方方言接近的成分，但廣東軍話與廣東的粵、閩、客三大方言相似之處也不少，這就造成了把軍話全部劃歸北方方言的困難……海南軍話接近北方方言的成分較廣東軍話的為多，但儋州軍話的聲母系統以及八所、崖城軍話的陽平變促聲又與一般的北方方言有較大差異……將其全部劃歸北方方言似乎不易被認可。而武平軍話則為客、粵混合語，永安軍話閩語成分較多。”；

“我們認為目前暫時還無法將軍話統一劃歸某一方言”。

由此可見，丘學強博士是認為各地軍話各具特色，不應該統一劃入哪個方言的。但他也不贊成隨便把它們當作不同的“混合語”。這一見解來自語言實際，並非空穴來風，因此我們認為是科學的，合理的。

2 關於軍話的來源

《軍話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特別注意到幾個結合：共時和歷時相結合；今音與中古音、近古音相結合；語音比較與詞彙語法比較相結合；歷史、人文資料分析與語言事實分析相結合。正是通過這些結合，特別是緊緊抓住歷時與共時相結合的原則來進行論證，才終於能夠有理有據地揭示出軍話的歷史淵源，而歷史淵源的顯示，又有助於進一步說明軍話的性質。根據大量的調查材料，在結合人文、歷史及語言發展規律的分析，就歷來學者對軍話來源的種種看法進行全面、認真的研究以後，本書作者在眾說紛紜中給軍話的來源下了“與明代衛所裡的軍戶有密切關係”的結論。認為“明代衛所軍人在戍地成家，且因世襲而世代相傳是軍話得以形成、鞏固和發展的重要因素。”在比較了明代前後有關韻書及當時的“通語”以後，作者認為軍話就其語言特點而言，與明代前後的“通語”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明代的“通語”是各地軍話形成和發展的語言基礎，“通語”中讀書音、南音、北音以及操軍話者原籍的方音是軍話形成之初就顯示各有不同的原因。在軍話發展的過程中，“通語”起到了一定的規範和制約的作用。各地軍話中一些相近或獨特的特點所反映的應該就是保留下來的明代“通語”的特徵。由於軍話一般都處於其他方言包圍之中，很容易受到其他方言的影響，因而軍話中其他方言的成分日漸增多，各地軍話本身原有的特色在其他方言的影響下也就逐漸減少了。有的還會因為特點的丟失和會說的人日漸減少而最終導致這一軍話的消失。

3 關於軍話的定義

在軍話的性質和軍話的來源都有了明確的認識以後。就有把握可以給軍話下一個明確的定義，以撥開彌漫在“何謂軍話”這個問題上的迷霧，讓人們對此有一個明晰的認識。在這一點上，《軍話研究》的作者給了我們十分明確而又很有說服力的結論：

軍話是散佈於粵、瓊、桂、閩等地的具有“方言島”性質的方言，它們因與明代衛所裡的軍戶關係密切而得名。軍話大多仍或多或少地保留了明代“通語”的特點，但以今天的面貌看，它們的語言特點各不相同，不應統一地劃歸某一方言。

這樣一個軍話的定義，綜合了軍話的性質、來源和特點，既準確地反映了軍話的實際情況，也體現出作者在全面研究各地軍話之後得出的獨特見解，無疑是合理的，有說服力的。

四

《軍話研究》一書除了較全面地論證並解決了有關軍話本身的一些問題以外，同時還討論了一些方言學上、乃至語言學上的理論問題和具體問題，得出了一些令人注目的結論。對於如何理解瀕危方言，對於方言的分區和方言島的確立，對於語言和方言歷史的研究，對於漢語發展史的研究，特別是對於近代漢語面貌的揭示，書中的論述和提供的資料，都能夠給人以啟示。拿對於瀕危語言和方言的理解來說，作者參照海內外專家認為可以從語言使用者和語言自身等角度對語言的瀕危程度進行層級劃分的做法，對於軍話是否應該歸入瀕危方言進行了很有說服力的論證。作者認為，“穩定但受到威脅的方言”、“受到侵蝕的方言”以及使用人口的不斷減少這些都是判斷一種語言或方言是否瀕危的重要標準，但從使用者的角度看，不能單純只看使用人口的多少。因為“處於封閉孤立鄉村的幾百人的語言群體所顯示的前景，比處於多語種混居中一萬人的語言群體所顯示的前景要樂觀得多。”在綜合分析語言發展前景之後，作者認定“軍話已經開始走向瀕危”。對軍話屬於瀕危方言的論證，無疑值得人們在鑒別其他瀕危方言時參考。在對待軍話歸屬問題上，如前所述，作者既不同意把各地軍話都歸入北方方言（島），也不贊成都推進“混合語”中去，作者的觀點是不同的軍話在歸屬問題上應作不同的處理，這種從語言實際出發的態度，無疑是方言分區中應該嚴格遵守的。至於《軍話研究》對於漢語史和漢語方言史研究的作用，只要翻翻書中聯繫歷史音韻，特別是探討明代前後的官話和各地軍話關係的論述，也就不難明白作者在這方面的良苦用心了。在這裡，我想還是引用書中的幾句話來作結束語：

．．．拜讀了音韻學專家們的不少有關元、明、清官話的著作和論文，經過反復的對比、思考和論證，更進一步地認識到：軍話是在南方方言包圍下的值得深入研究的方言，而要研究元、明、清時期的“通語”，現代的某幾種“軍話”也許就是“活化石”。至少，用軍話與前人留下的韻書互相印證，將有助於更好地研究當時的“通語”。

軍話的研究價值如此顯著，其他任何一種未被染指的瀕危方言，一旦進行全面深入的調查研究，又何嘗不會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學術價值呢！正因為這樣，我不禁要大聲疾呼：瀕危方言的研究大有可為！